

印尼“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及其活动概略

蔡仁龙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即现西加里曼丹)等地区的广大爱国华侨曾和印尼人民一道组织了地下抗日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是组织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支抗日组织。西婆罗洲广大抗日志士和爱国华侨及印尼人民遭到日寇的大屠杀也是整个印尼规模最大的和最为残暴的。但是至今,对“西盟会”及广大爱国华侨抗日活动事迹除了个别文章中三言两语的道及外,还没有任何较详尽记载。笔者当时居留西婆罗洲山口洋,耳闻目睹,亲历了其中一些事实。近年来,笔者又向当时一些“西盟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进行了调查访问。现将“西盟会”及其一些活动情况整理于下,供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的同仁参考。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在1941年12月8日,以海、空军对美国珍珠港采取突然袭击开始的。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早已部署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进军。日本陆军派第二十五军和第三航空集团进攻马来半岛;派第十四军和第五航空集团进攻菲律宾;派第十五军进攻泰国和缅甸;派第十六军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日本南侵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掠夺东南亚地区的石油、橡胶、椰子、铁矾土、锡等战略资源,以支撑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和称霸亚洲的迷梦。荷属东印度是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产地,特别是石油。早在1940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曾向荷兰政府提出一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放宽贸易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经营企业的便利,放宽对于在荷印日本

商人雇佣人员和工人入境的限制等等。1940年5月18日,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规定了荷印供给包括比以往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的铁矾土、石油等在内的13种原料、资源的最低限额(《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历史学研究室会编,第三卷)。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荷属东印度早就有觊觎之心。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发动空袭珍珠港的同一天,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宋卡、(Singora)和哥打巴鲁(Kota Baru)等地登陆。只一个多月即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1942年2月8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2月15日,英国远东军司令珀西瓦尔同日军山下奉文大将会谈。该地区的英军终于无条件投降。

日军在进攻马来半岛的同时也调遣了一支部队于1941年12月先占了荷印重要的石油产地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现称苏拉威西)。然后这些部队,从马来半岛和西里伯斯岛东西两面夹攻爪哇。婆罗洲日军则在北面阻击。1942年2月14日,日本陆军空降部队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降落,由今村均率领的第十六军在2月17日轻易地占领了该地区。1942年2月28日,日军分别在西爪哇的孔雀港、万丹、南安由等地登陆,3月5日即占领了荷印首都巴达维亚(即现雅加达),3月7日占领了东爪哇省首府,荷印最大的军港泗水,6月9日,荷军即宣告投降。从此整个荷属东印度便处在日寇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开始了3年8个月的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

(二)

根据1930年荷印政府统计局统计,西婆罗洲人

口共 827898 人,其中华侨人口为 109317 人。主要的城市有首府坤甸(华侨 26425 人)、山口洋(华侨 37872 人)、喃吧哇(华侨 18941 人)、上候、道房、三发、邦夏、松柏港、新党等。1930 年调查以后,因战争影响,没有再进行统计。1949 年 2 月西加里曼丹当局公布了 1948 年人口调查统计,全西加里曼丹已增至 1179827 人,比 1930 年增加 38 万余人。18 年来平均每年增加两万余人。1948 年华侨则增至 203305 人即比 1930 年增长了 1 倍,平均每年约增 6000 余人,剔除在日寇统治的被屠杀及自然死亡者外。据此推算,在 1941 年底,日军侵占西婆罗洲时,境内华侨人口约 16 万人。

日军在 1941 年 12 月 19 日派飞机 9 架轰炸西婆罗洲首府坤甸,投下大量燃烧弹,使坤甸市顿成火海,然后迴旋扫射约 2 小时,死伤约 2000 余人,其中 95% 为华侨。不久即派日本陆军登陆。当时驻守西婆罗洲的荷军及荷印保安军(有华侨及印尼人参加)虽组织了一些阻击,但终于在势单力薄、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迅即败退。日寇长驱直入,占领了整个西婆罗洲。广大华侨及印尼人民多已逃至农村及山区避难,过着吃木薯、椰子等杂粮的生活。城镇荒凉,物品奇缺,日军为了支撑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强制实行法西斯法令,到处搜捕强迫印尼人民及华侨迁回城镇,组织了日伪维持会等以维持其军队的供应和全境的社会生活秩序。由于日寇法西斯的残暴统治,西婆罗洲的爱国华侨先进分子,1942 年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进行地下串联活动,先后与各地区各种派别的分散的抗日力量联系,密切合作,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在西婆罗洲地区还有如下几支抗日力量:

(一)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山口洋的企业家黄能昌的长子,据说其父过去曾开发过金矿,有矿山及一些橡胶园、椰园等,全家笃信天主教,大战前与荷印政府关系密切,黄春枝也曾是荷印保安军山口地区负责人之一)等领导的荷印散兵及荷印保安军散兵约 200 人左右。这部分人大部分隐藏在三发县三发河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

(二)由李石祥(山口洋商人、爱国华侨)、冯传旺领导的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他们原是在日寇侵占西婆罗洲前,由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等组

织起来抗击日军侵略的。此外还有各地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华、印中上层人士。

(三)由原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领导的国民党党员搞的反日活动。

1942 年底,经过了两个月的串联及筹备工作以后,正式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华侨学校教员和商店职员。

“西盟会”正式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在西婆罗洲的主要城镇及农村地区成立了 15 个“西盟会”分会。这些分会及其负责人如下:1、坤甸分会,人数 300 余人,主要成员是铁工厂、木材厂等工人。2、松柏港分会,人数百余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3、喃吧哇分会,人数五六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店员。4、百富院分会,人数四五十人,主要成员是渔民、椰园农民和工人。5、大完肚分会,人数 50 余人,主要成员是渔民。6、把西路下横分会,人数 400 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华农。7、山口洋分会,人数约 300 余人,主要成员是店员、运输搬运工人、小商贩、教师和部分青年学生等。8、港坪分会,人数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是椰农、渔民。9、文岛宜分会,人数约 100 人,主要成员是渔民、椰园农民、店员。10、邦夏分会,人数 200 人,主要成员是渔民、小商、店员、教师、运输搬运工人等。11、三发分会,人数 100 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农民、店员。12、日芒头分会,人数 50 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农民。13、孟加影分会,人数 200 余人,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农民。14、福律分会,人数五六十人,主要成员是农民。15、百万突分会,人数 50 余人,主要成员橡胶园工人、小商贩。

除上述分会外,还在其他一些乡村和市镇设立了一些联络点,人数五六十人不等。全体成员总数在 3600 人左右。

(三)

“西盟会”成立后,除积极发展组织,建立各个分会外,它的活动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2 年秋成立起至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时为止,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建立武装根据地,开展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破坏和袭击日寇的交通运输和供应，对日军驻地和伪警察署或巡逻队进行袭击等。但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战斗。当时“西盟会”建立了两个武装根据地。一是把西北区根据地。这是“西盟会”的武装斗争组织大本营，在这里收集储藏了枪枝子弹、粮食等物，训练武装人员（包括隐藏被日寇通缉的各方人士）。把西山区的武装队伍称为“中国义勇军”。主要在坤甸——山口洋公路及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西盟会”刚成立时，仅有爱国华侨张伟邹捐献的1支重机枪、3支自动步枪（黄春枝家捐献）、5支左轮手枪及10余个手榴弹。这些都是原荷印保安团成员留下私藏后捐献出来的，此外尚有10余支土制猎枪。

第二个根据地是三发河流域根据地，这是由原荷印军散兵负责人巴帝辛和黄春枝领导的。这里原有两百余人，几乎人手一枪，还有一部收发电台，装备较为充足。主要在三发，邦夏水陆两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活动。黄春枝被日寇逮捕后，这个根据地的武器都转归“西盟会”掌握。此外，李石祥系统的保卫团成员在荷军撤后也留下了部分的枪枝弹药。同时，“西盟会”还积极派人到西婆罗洲和北婆罗洲交界的硕莪山区收购英军败退时落民间的枪枝子弹。三发、孟加影等地分会游击队袭击当地警察署，缴获当地警察部队的全部武器来武装自己。因此，据不完全统计，“西盟会”后来拥有的武器有重机枪4挺、各种步枪、手枪约2000支、手榴弹数百颗、子弹近万发。

（二）积极开展抗日和反对德、意法西斯的宣传活动。“西盟会”利用电台，经常收听澳洲电台的国际战事广播，将收听的新闻，世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战讯，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战讯，印成传单散发，或向各分会及队员并通过他们向华侨宣传，同时经常揭露日寇屠杀华、印（尼）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号召全体华印（尼）人士，团结对敌，打击日寇，不和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和日伪合作，鼓舞华、印（尼）人民战胜日寇法西斯的信心，这方面也收到相当的效果。在这些抗日武装斗争中，卡江上游昔加罗、上候等地华印（尼）两族人民联合组织的抗日武装与日寇侵略军的战斗是其中最为激烈之一。1942年夏，当地部分爱国华侨收集荷印军走时丢弃在民

间收藏的枪枝弹药，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武器。同时他们还积极与当地印尼人及少数民族达雅族的抗日志士联络，建立抗日同盟。该抗日同盟的领袖之一印尼人科斯曼（Kosman）荷印时原任昔加罗的行政长官，1944年4月和其他12名华印（尼）抗日同盟负责人及抗日志士被日寇逮捕，除一人逃还外，均惨遭杀害。1945年4月，昔加罗、上候等地的抗日战士在队长邦苏玛（Pan—soema）领导下，进占叻料（Meliau），斫杀了日寇特警队长中谷及其同伙3名日军。这一战斗行动震动了西婆罗洲，大家无不拍手称快，大大地鼓舞了各地华印（尼）人民抗日斗争的斗志和信心，打击了日寇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日寇从坤甸调遣海军陆战队乘汽艇溯江而上向叻料反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日寇再次登陆占领叻料时，邦苏玛挥舞大刀扑杀日寇登陆的队长，终为乱枪杀害，壮烈牺牲。但抗日战斗并没有结束，蔓延至梭梭、万那、打芒、拉越及昔加罗等地，声势相当浩大。许多印尼人民，达雅族及华侨群众都输送粮食、物资等支援抗日游击队。1945年8月1日抗日游击队进攻昔加罗县城，日寇无法抵御，惶惶败退遁去。8月3日，日寇由上候调来大批援军进行垂死前的挣扎，先在江心艇上用机枪向昔加罗扫射了数小时，游击队因寡不敌众，弹药不足而撤离。3日下午昔加罗再度沦入敌寇之手。8月5日，华、印（尼）抗日游击队各地负责人在打芒开会研究后，重新作了战斗部署，派了部分华侨及印尼抗日战士破坏昔加罗至上候，昔加罗至拉越的公路、桥梁等交通线和电话线，部分则在打芒发动群众，准备物资，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日寇投降为止。9月初，日寇投降消息才传到山区，抗日游击队高奏凯歌，接管了昔加罗等地。卡江上游地区华、印（尼）人民的联合抗日武装斗争，以印尼人民为主，但两族人民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印（尼）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用共同的鲜血再次写下了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历史篇章，是十分可贵的。

（三）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和其他政治犯。对被日寇追捕的抗日分子及同情者，以及荷印时代的军政人员，尽力协助他们脱险并根据不同情况转移到根据地或北婆罗洲等安全地区安置。对他们的家属也是如此，对有生活等困难的给予适当解决。与此同

时，积极进行锄奸活动。“西盟会”组织了“肃奸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根据当时各地掌握的敌情和群众检举揭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山口洋、邦戛、孟加影一带就逮捕了罪证确凿、民愤较大的汉奸特务近百人，由“中国义勇军”进行逮捕、关押和审讯。日军投降后，“西盟会”武装复员时，将这些人移交给重新接管西婆罗洲政权的荷印军看管。

总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立后，虽没有组织较大的和日寇占领军的正面战斗，但对于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反对日寇在西婆罗洲的法西斯统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他们的力量，削弱他们的后方供应地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占领军对“西盟会”及华印（尼）人士的团结抗日活动，吓得要死，怕得要命，恨之人骨，千方百计的派遣许多暗探特务进行暗查和侦察。由于这些汉奸、特务无孔不入的猖狂活动和抗日组织人员缺乏经验及丧失警惕，招致了日寇法西斯对西婆罗进行三次震动全印尼的规模空前的大逮捕和大屠杀，被捕的华印（尼）人士约3000余人，其中华侨1500余人。

这几次大逮捕的情况简述如下：

第一次大逮捕发生在1943年2月13日。

西婆罗洲各主要城市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发、喃吧哇、松柏港等地的印尼人民及华侨，像往常一样7时左右早饭后，商店陆续开门，教师和学生正赴校上课，公务员正在上班……这时，由日本占领军宪兵司令部派出无数的警察、特务、爪牙等按照他们手上的黑名单，挨家逐户通知他们立即跟随来人到指定地点“开会”，日本军方将有事情“通知”。当时接到通知的人士对这一异常做法虽表示惊异但却没有高度警惕，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神秘而恐怖的大逮捕活动。因此他们都只身穿一套普通衣服，没有带任何其他生活用品，也没和家人作任何告别的情况下随同来人去了。到了中午时分家属们才发现这是本市（地区）普遍的情况，被叫去的人大都是的工商业、文化教育界，包括日寇维持会的一些上、中层知名人士和负责人、爱国华商、教员等，既不知他们到何处，更不见任何一个回来，后来家属们通过到有关机关追问，才知他们全部已被拘留逮捕了。第一次

西婆罗洲的大逮捕大多就是用这种诱骗的诡计进行的，这次被捕的华印尼人士有500余人，都是中上层人士和荷印时代的一些官员。被逮捕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也不知他们拘留何处，犯了什么罪和命运如何？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次逮捕也缄口不言。

第二次大逮捕发生在半年以后，即194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这次是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怖的野蛮方式。那天凌晨，各地不少城郊农民正拖着一些农副产品到市场赶集以换取一些生活日用品。由于这是中秋节前夕，所以比平常较为热闹一些，但当他们准备进城时，各人城要道都有日军站岗把守，不准进城。原来昨晚已宣布各地戒严，大逮捕直到凌晨仍在进行。日寇宪兵军警人员亲自出面，在特务汉奸的带领下按照黑名单驱车挨家搜捕。敲门冲入去后，立即用麻布袋或面粉袋套在被捕者头下扎紧，双手反绑推入汽车拉走，因此不少被捕者当时刚从床上起来，只穿一条背心和内短裤，也没穿鞋子而被绑走的。那天西婆罗洲各城镇一片白色恐怖，没有一间商店开门，马路上也几乎无人行走。这次由日特种部队（属海军陆战队）在全西婆罗洲逮捕的华印（尼）人士约1000余人。

事后不久，由日寇占领军主办的坤甸《西婆罗洲新闻》（4开·中文版）报导，说什么日本皇军破获密谋反对皇军妄图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的抗日组织，并刊出声言已被枪决的所谓“婆罗洲共和国”首领黄业纯，江周纪等12人的名单和像片，以及所谓被缴获的一大批枪枝（照片上排列了十几枝）子弹的照片等等。这样，广大的华、印（尼）人士及被捕者家属才意识到，被捕者生还的可能性是极为渺茫了。

根据当时“西盟会”掌握的情报，第一次逮捕起因是因为隐藏在百万突村黄春枝橡胶园内的荷兰人夏格（原山口洋市土地局长）被附近的村民告密被捕，并且在校园工人宿舍内搜获了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是黄春枝本人收藏的）。作为校园主人的黄春枝父亲黄能昌也当场被捕（黄春枝当时不在该校园内）。隔天，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即在全西婆罗洲各地进行大逮捕。

第二次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隐藏在三发河中游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领导、黄春枝接济的荷印军

散兵一支 10 余人的小分队，被当地日寇驻军突然袭击并全部被俘，当天晚上，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在全洲范围进行了大逮捕。被捕华印（尼）人士约 1000 余人。这次被捕的包括与“西盟会”关系密切的李石祥、冯传旺、李贵郎和黄春枝本人，还有黄春枝的胞弟黄华秀，黄春晖，以及黄春枝的妻弟谢石奎，妹夫萧水华。总之黄能昌、黄春枝全家的成年男子无一幸免。黄春枝的堂兄黄春发、堂弟黄耀光及其另一妹夫谢石金则由“西盟会”及时派人援救，转送人把西山区根据地，幸免于难。这次被捕者中尚有不少是“西盟会”的同情者或与“西盟会”有过关系的人，如山口洋的李任苍、蔡秉枝、黄祥灵等，坤甸方面有蓝琼山、张恢原、凌祥隆等。潜伏在山口洋郊区的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已直接参加“西盟会”）及其旧部 13 人也于此次被捕。

对于日寇法西斯大逮捕的起因最初也曾有过下述说法：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李石祥及其战支在某橡胶园中挖起一部分枪枝转移到另一胶园中，不料由于警惕不够，被日寇一特务发现告密后被掘出，李石祥等即遭到逮捕。日寇怀疑有地下抗日组织，从而在全洲开始了大逮捕。《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刊登的枪枝照片即是其中被掘出的一部分。

日寇在《西婆罗洲新闻》日报上登的所谓成立“西婆罗洲共和国”和查获的枪枝弹药等完全是捏造的。在被捕和公布枪决的所谓 12 名“西婆罗洲共和国”首领中，只有黄业纯和江周纪两人和“西盟会”有过关系。

黄业纯是西婆罗洲“合丰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是西婆罗洲第一流的工商企业家。在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发等地都有“合丰兄弟公司”，拥有不少工厂、胶园、椰园、电影院、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其弟黄业江则主持山口洋的公司和企业，山口洋最大一家电影院及唯一的制冰厂都属他所有。李石祥因生意关系和黄业纯、黄业江兄弟有联系，“西盟会”成立后，李石祥曾经向黄业纯、黄业江兄弟劝募捐款接济“西盟会”。江周纪是荷、华混血种人，原任山口洋市政府秘书官，在荷印时期，和黄春枝一家有来往，较为熟悉，日寇占领山口洋后，江周纪避难隐居在山口洋附近的福律镇郊区农村中，生活由黄春枝接济支持。因此这几个知道西婆罗洲有地下抗

日组织，其他 10 人则都是荷印政府时期的政府官员、医生或工程师等，和当时地下抗日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有这种组织，可说是无辜的。至于照片中的枪枝弹药，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时，原荷印军自卫团撤退时丢弃的。

第三次大逮捕发生在 1944 年秋。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是无论在中国、欧洲还是在太平洋等战场，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德、意、日法西斯的反侵略战争者处在大反攻阶段。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由于前线惨败，兵员吃紧，印尼各岛包括西婆罗洲兵力正不断被调往前线，企图挽回败局。为了镇住后方，他们进行第三次大逮捕和大屠杀。

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为了接济“西盟会”，派人押运一批物资（主要是布匹）到西婆罗洲，并准备购买一批药品运返北婆罗洲。这批物资和布匹顺利地到达抗日根据地。在装运药品返回北婆罗洲途中，距离山口洋市 6 公里的沙垄港口时，被日寇特警队截获。被捕的搬运工供出货主姓名和地址，因此负责此事的“西盟会”负责人同时被捕。“西盟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山口洋取道孟加影，越过华莪山区返回北婆罗洲，从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当时，日寇虽然把这批药品当作“走私”商品处理，但由于从北婆罗洲派人来西婆罗洲活动的情况，已被日寇军警特务侦察到，因此，在破获药品和运出口事件后，除派大批特务暗探到处搜捕林立信外，在全西婆罗洲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这次被逮捕的华印（尼）人士约 1500 余人。除了极少数是参加“西盟会”抗日组织的成员外，绝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工人、中小学教员等爱国华侨。

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占领西婆罗洲 3 年零 8 个月中，三次逮捕了华印（尼）人士 3000 多人，除了第三次被捕者在日寇投降前夕因被打被饿或病得骨瘦如柴的 300 多人释放回来外，其余 2000 多人下落在那里呢？这个谜一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得到解答。成千上万的被难家属们在日寇投降初期，都曾抱着期望和祈祷被捕的亲人们能安然归来。然而血的事实终使他们的期望成了泡影。

日寇投降几个月后，才陆陆续续的传出所有被

捕者已罹难，除部分在日本法西斯监狱中被审讯拷打致死或病死者外，绝大部分被活埋在坤甸郊区的榴莲港机场和东万律机场。

笔者作为被难家属成员之一，于1946年2月17日，曾随同山口洋市的部分被难家属们乘了几辆大汽车前往东万律飞机场亲自目睹了被难者活埋的现场并进行祭悼。活埋被难者们的惨绝人寰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早在每次大逮捕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在坤（甸）山（口洋）公路上，在漆黑的深夜有过多次日军军用卡车装满东西，用帆布蓬遮盖得严严实实，上面坐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寇押运，既不知押运什么东西，也不知运到何处。现在真相终于大白。当时，被捕者一个个被双手或全身反绑，扛上汽车，层层叠放，运到上述两个机场秘密活埋的。

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空地，因无使用，年久失修，到处杂草丛生。现在这一大片空地到处是活埋人的大坑，每个坑长约8至10米，宽约3至5米，深5至10米。日寇投降后，由“西盟会”会同一些地区的中华公会派人埋人坑进行了整理，每个坑周围边缘锄一小沟。每个坑面泥土上仍布满了无数的尸首盖骨、四肢、肋骨等各种碎骨以及无数沾满污血、血迹斑斑的破衣服碎片，惨不忍睹。显然这些是被难者们在被处决和活埋前被殴打或和敌人搏斗致伤的标记，也是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一个罪证。全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埋人坑，据说每个坑被埋三四十至七八十个人不等。被难家属们见此惨状无不嚎啕痛哭，悲痛欲绝。但是谁也无法找到和认出自己的亲人。我们将布满坑面上的头盖骨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下，举行了简单隆重的悼念仪式。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头盖骨而已，大部分尚埋在各坑的泥土下。据一些住在东万律镇附近的侨胞们说，当时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都被列为禁区，这些埋人坑也多是日军用枪枝逼迫被捕者挖的，然后将他们一个个推进坑内。有反抗的，即遭刺刀刺杀或开枪屠杀。在那些夜晚，凄厉的嚎叫声，划过长空，极为悲惨和恐怖。由于日军在周围进行警戒，长期无人敢去观看，直到日寇投降后才真相大白。

为了纪念这些被日本法西斯残暴杀害的华印（尼）抗日人士及爱国者，日寇投降后，各地中华公

会积极筹款在坤甸、山口洋和东万律建造了3个“被难华印人士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这3个城镇。

（四）

“西盟会”第二阶段的活动是从1945年8月至1948年6月。

日寇投降前夕，“西盟会”根据当前的形势：曾讨论确定了工作方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组织动员武装力量，分别进驻所有大中城市，监视日寇投降活动，保护人民安全。8月底盟军先遣部队代表（澳洲军代表）抵达坤甸，和“西盟会”代表会谈取得了协议，决定由西婆罗洲华印人士联合组成23人的“保安委员会”。负责接管日伪政权，华方代表12人，由“西盟会”指派，印尼方代表11人，由当地各党派派出。正职由华侨担任，副职由印尼人士担任。实际上，盟军（英、荷、澳等军队）的目的是在荷、澳军队大批开入西婆罗洲重新接管政权以前，把“保安委员会”作为一个缓冲作用，从而阻碍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取得独立接管政权。“保安委员会”下设“保安队”代替警察部队，维持地方秩序。队员中华人占60%，由“西盟会”指派；印尼方面占40%，由印尼独立运动组织派出和伪警改编，队长以上的正职仍是华侨担任。

“保安委员会”总会设在坤甸。中、小城市设分会在50余个单位。全部所属保安队员约3000余人，约1/3的队员配备有武装。“保安委员会”在日寇投降初期，在维持西婆罗洲社会秩序和治安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清查敌产。各地“保安委员会”下，设立了“敌产保管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设主任一人（华侨担任），副主任两人（华印各一人），负责调查日伪军营物资、码头、仓库、银行以及政府机关设备等一切敌人财产，一一加以清点查封。

第三，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由“西盟会”组织“肃奸委员会”负责。

第四，调查登记日寇在占领期间，主要是三次大逮捕中被惨杀人士名单及去向、活埋地点以及被难人士的财产损失及其家属的困难补助，生活赡养等善后处理问题。

这期间，在印尼各地，特别是爪哇，以苏加诺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而斗争。

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和印尼共和国的诞生。但是荷兰帝国主义仍企图卷土重来，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

1945年底，经过周密的策划后，荷兰军队在澳洲军队的密切配合下，从海空两路大批开进西婆罗洲，接管西婆罗洲各地的政权，扶植荷兰帝国主义对西婆罗洲进行殖民统治；镇压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和扑灭“西盟会”的抗日进步力量。这个做法和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做法是雷同的。

由于荷军重新掌握西婆罗洲政权，而且极力拉拢扶植原亲荷派的势力和人员，对“西盟会”和华侨及印尼的抗日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和软硬兼施的政策，达到其扑灭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重新统治西婆罗洲的目的；而“西盟会”原来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由政治观点极不同的派别或集团结合在一起，没有统一的任何政党的坚强领导。日寇投降后，各派别和集团为了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利益也不可能一致。在此情况下，“西盟会”内部也急剧发生了分化。

一、思想倾向进步的一派（“西盟会”骨干）主张武装对抗，不让联军接管部队登陆，并联合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力量，坚决反对荷帝的殖民统治。虽然这一派人数多，实力最大，但由于经过3年多的战斗和艰苦生活，现在日寇已投降，认为胜利了，实现和平了，这部分人中大多数成员多属农民、渔民、店员等，组织也较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渴望回去谋生，因此正当“西盟会”代表与荷军司令部谈判尚未结束，总会也未作出最后决策的情况下，不少武装队员即纷纷自动携械离队回家去了。从而失去武装斗争的支柱。

二、荷军登陆后，原荷印军的散兵经荷印政府收留，大都被改编调去爪哇等地区镇压当地民族独立运动。

三、以×××等天主教徒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企图搞第三势力，事实上他们是亲荷派。他们公然反对建立联合统一的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和联合当地民族共同抗荷的原定计划。曾提出把“西盟会”改为一个定名为“民主同盟”（不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西婆罗洲共和国”，并马上印发共和国纸币等主张。“西盟会”领导机构和×××等人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主张被

否决后，即撕下了伪装的外衣，公然和荷帝合作，公开和“西盟会”对抗。他们造谣诬蔑“西盟会”是共产党的组织。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把接收过来的“西婆印务馆”作为私产，擅自把原计划由坤甸中华公会主办的《中华公报》改为《中华日报》。不仅拒登“西盟会”的稿件消息，表面上是公正中立，实质上站在相反的立场，攻击反对建立华人统一领导机构。为此，思想倾向进步的华侨另行筹组出版了坤甸《黎明报》。

四、部分国民党员，到各地搞复党活动。战前中国国民党在西婆罗洲有坤甸、山口洋、喃吧哇3个直属支部，其他各城镇共有分部100多个，人数不下2万人。当时中国经过8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成了中、苏、英、美四强之一，广大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感到骄傲。但西婆罗洲地处偏僻，他们中间不少人并不大了解国内情况，不很清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结果，不少人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蒙蔽。日寇投降后，他们乘势一度曾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公开抢夺侨团、侨校并怂恿荷帝逮捕抗日分子和拒绝恢复国民党籍的旧党员，诬陷他们为共产党秘密组织收藏枪枝和印尼人民一起反对荷兰政府，搞独立运动，企图暴乱等等。

由于“西盟会”内部分裂，荷军重新占领了西婆罗洲。他们急于全面掌握政权，十分害怕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便步步进逼。荷军先遣部队司令樊·穆克，曾正面提出要求抗日武装立即复员，态度极为蛮横。“西盟会”在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下，不得已曾提出了复员的几个条件：

一、荷军进驻每一城市，必须事前3天通知当地“保安委员会”，避免与所在地的保安人及“中国义勇军”发生误会而引起冲突；

二、各地保安队要根据自愿原则，改编为正式警察（包括各级警官），但只限于维持地方秩序，不能把他们调动去反对印尼独立运动；

三、对“中国义勇军”和自愿复员的保安队员，除补发入伍以来的工资外，并加发3个月工资为复员费；

四、惩判日、伪特务、汉奸，“西盟会”逮捕的百余名汉奸特务移交荷军法庭进行审判；

五、赔偿荷军撤退进行焦土政策时被毁的华侨财产；

六、建立华印人士被难纪念碑，抚恤被难家属；

七、废除侨长制度（即甲必丹制、老大制）及人头税，承认各地“中华公会”为华侨统一领导机构对内有权处理华人事务，对外有权代表华侨办理保护华侨有关的交涉事宜，等等。

事实上这些条件是带有妥协性的。荷军司令表面上表示接受，但又借故拒绝在谈判纪要上签字。“西盟会”代表也明知荷军方面言而无信，即使这样一些条件也不可能接受实行（果然后来只履行了第六、第七两条件，其他有的不完全兑现，有的根本不认帐），但“西盟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势难坚持，各地保安会的一些胆小怕事的负责人也纷纷辞职不干。1946年初谈判后一星期，“西盟会”即公开宣布，抗日工作至此结束，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即日起开始全面复员……并号召全西婆罗洲各阶层侨胞成立“中华公会”，为维护华人正当权益做好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而努力奋斗。“西盟会”并通令各地分会把枪枝子弹和关押的汉奸特务交给所在地荷澳联军。“保安委员会”总会也通知各保安分会，移交敌产和政府机关，并宣布解散“保安会”。从此“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组织表面上已不再存在。“西盟会”各地交出的枪枝等约1500多支，各种子弹数千发。

1946年初，“西盟会”宣布复员后，各地分会成员很快参加筹组“中华公会”活动。不到半年时间，全西婆罗洲各地的“中华公会”纷纷成立，总会设在坤甸。各中、小城镇共设“中华公会”分会100多个，各地“中华公会”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属“西盟会”的成员。

“中华公会”组成初期，主要任务是团结各阶层华侨，举办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并教育华侨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反对荷印殖民政府战前“以华制华”的侨长制度，并全力做好被难家属的抚恤工作和华侨物资配给工作。因为战后初期，粮食、布匹、糖、盐等较为缺乏，全西婆罗洲各地居民都实行按每户人口定量配给制度。这个工作对安定广大华侨生活曾起过一定良好的作用。各地中华公会一般都下设“中华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各侨校的复办和教育经

费等工作，因此各地侨较不少统编为“中公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等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还组织“中华青年会”，“中华妇女协会”等分别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大中城市的“中华公会”还下设有“工商部”负责华侨商业和劳工事务。各地“中华公会”成立初期，战前华侨社会中的各个同业团体，同乡会宗亲会等社团不再出现，国民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也比战前减少了2/3左右。

荷兰帝国主义在印尼各地也重新篡夺了抗日胜利的果实，掌握了政权，并且疯狂地镇压各地民族独立运动。西婆罗洲荷兰“尼加政府”对争取印尼独立运动分子和华侨抗日分子进行镇压。特别是山口洋等一些地区，荷兰驻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传讯和搜查原“西盟会”主要负责人，追查“西盟会”武器下落，一些积极的抗日分子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原思想较进步的“西盟会”的负责人极为气愤，感到忍无可忍，因此联系了一部分人重新拿起武器，成立了“人民锄奸团”。“人民锄奸团”对荷军的镇压和迫害，进行武装反击。但是这种反击并不是组织武装来打击荷军，而只是清除一些汉奸、特务而已。“人民锄奸团”曾先后采取暗杀手段打死了张亮（汉奸、山口洋一个搞宗教迷信的神棍。其儿子是日军翻译、汉奸），钟国仁（汉奸、一间咖啡店老板）等7人。1946年8月29日，又打死了荷军侦探长阿目。第二天，荷军如临大敌，派水陆两路全部武装士兵开到山口洋包围全市，逐家逐户强迫华侨下半旗为被杀的侦探长致哀，因绝大多数的华侨都拒绝下半旗，结果军警不断鸣枪恐吓，并开枪打伤10余人，捣毁不少商店，引起全洲各地罢工、罢市，与荷军殖民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荷军被迫终于撤换了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总监。这就是山口洋的“八·卅事件”。“人民锄奸团”这种以暗杀手段来消灭一些汉奸特务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纠正。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西婆罗洲华侨对荷军及其爪牙和原来一些汉奸特务的切齿痛恨。“人民锄奸团”接受批评后，于1946年秋解散。“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从此结束其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